

证经补史：西藏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 新现元代诏书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初探^{*}

熊文彬

西藏阿里札达县皮央村杜康大殿写本中保存有一页元代的重要文书。从文字的格式、用词、语气和语法特点可知，该文书为元代诏书录文，由元代当地人笔录在古代佛经目录末的空白处，其上同时鈐有一方八思巴字墨印。诏文下令僧众严格遵守法律，虔心修习佛法。此诏书录文系元代中央政府治理阿里地区的直接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札达县 皮央杜康大殿 元代诏书录文 八思巴字墨印

作者 熊文彬，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2020年7-8月，四川大学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阿里后弘期初的佛教遗存与多民族交融研究”课题组对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遗存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首次调查，在其中一页写卷的末尾发现了一件元代诏书录文和一方八思巴字印文。这是迄今在阿里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相关文物。鉴于这一发现为元代中央政府对阿里地区的治理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证据，甚为重要，故略加考述于下。

一、写卷发现地

该写卷保存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皮央村杜康大殿。写卷为某一佛经写卷的末页，其尺寸长65厘米，宽20厘米，质地为藏纸，页面中部两端对称地绘有两个红色圆圈，中心穿孔，四周边缘略残，两端有水渍（图1，见彩色插页，不另注）。

杜康大殿位于皮央村东嘎村皮央组前山中部，周围分布着近千座石窟和寺院遗址。根据石窟和寺院形制、功能及其中的绘画和雕塑遗存，学术界将其年代上线推定为11世纪^①。杜康大殿为一层平顶方形建筑，其始建年代无考。殿内原有雕塑和壁画，但塑像已荡然不存，壁画也只在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阿里后弘期初的佛教遗存与多民族交融研究（19ZDA177）”的阶段性成果。杜康大殿写卷调查得到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夏格旺堆研究员、札达县文物局罗丹局长和杜康大殿文管员的大力帮助，特此申谢。调查者除笔者外，尚有穷达、张延清、廖暘、杨清凡、陈粟裕、图旦次朗、唐樱家和黄梦雨等人。其中，熊文彬和杨清凡二人参加了2019-2020年两次调查的全过程。

①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系《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97年9期第8页；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编著《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20页。关于皮央、东嘎艺术题材的研究，分别参见霍巍：《试析东嘎石窟壁画中的佛传故事画——兼论西藏西部早期佛传故事画的式样及其源流》，《西藏研究》2000年4期第62-70页；杨清凡：《东嘎石窟壁画双身图像辨识》，《考古与文物》2007年6期第85-92页；王露、罗文华：《西藏阿里地区皮央石窟护法神殿壁画考察报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12期第89-102页和2020年1期第93-106页。

墙裙上方有部分残迹。其风格与相距不远的托林寺和古格故城的白殿、红殿等壁画十分相近，据此推测，该殿应建于15-17世纪。殿内遗存文献主要保存在两侧壁前的玻璃柜中，共计260余函。文献内容主要为佛教经典和世俗文献两类。经初步研究，其年代跨度上千年，最早的文献系9世纪末的吐蕃时期译入，最晚的文献则包括17世纪末清初的写本。^① 这批文献主要有两个来源：部分为杜康大殿原有文献，而另一部分则源于周围石窟和寺院。

按藏文文献，皮央（*phyi dbang*）曾是古格王国重要的政治和宗教中心之一。从11世纪开始，该地就是古格王国的都城之一。尤其在明代，古格王国在此建有王宫。按15世纪格鲁派著名大师阿旺扎巴撰写的《阿里王统》（*mngav ris rgyal rabs*），古格国王平措德（*phun tshogs sde*，1409-1481）在16岁前曾被迎至皮央居住。^② 同时按《黄琉璃》，与其相邻之地东嘎也是古格王室成员重要的宗教场所之一，格鲁派重要寺院扎西曲林寺（*bkra shis chos gling*）最早就也是由古格王旺秋德和南杰德修建而成，而后赠送给阿旺扎巴的。^③ 虽然该地在后弘期初的历史不详，但在杜康大殿保存的题写有明确译师名字、亦即大批吐蕃时期译入的佛经和仁钦桑布（958-1055）与萨迦班智达（1182-1251）译入的佛经，以及皮央79号窟、93号窟和东嘎1-3号窟保存的壁画、皮央旧寺出土的青铜造像等考古证据表明，^④ 该地自11世纪以来应为古格王国重要的宗教中心之一。由此可知，元代诏书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在此出现也就顺理成章。

二、写卷内容和年代

写卷正面墨书6行文字，背面无字，显然系某部经典的末页。内容由经名、诏书录文和印文、祈愿文和六字真言等4部分组成：其中前3行邬坚体为经名，末尾分别铃有一方吉祥结纹和八思巴字墨印；第4行为诏书录文，为长足体，文头上方铃有3方吉祥结纹墨印。第5行起始部分为藏文第一组字母，为邬梅体，其后两个红色圆圈中分别墨书邬坚体祈愿文“*bkra shis par gyurd cig*”，即“吉祥如意”之意。最后一行为邬梅体的六字真言（图1）。

从整体内容和篇幅可知，接续上页的3行经名是写卷的主体。按经名末尾“共十六部”经可知，该页共保存了其中12部经典的名字，其原文和译文分别如下：

……*chen povi mdov/vphags pa dad pavi stobs bskyed pa la vjug pavi phyag rgy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v/vphags rgyan sdug po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v/vphags pa de bzhin gshegs pa bdun kyi sngon kyi smon lam kyi khyad par rgyas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v/vphags pa bkra shis brgya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v dgang bcas pavi thsigs su bcad pa rnams/dpal lha mo chen movi bkra shis/vphags pa bden pa bzhivi mdov/sangs rgyas kyis za cig pavi yon tan gsungs pa/ vphags pa spyen ras gzigs dbang phyug gyis zhus pa bslabs pa bdu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v/vphags pa gser kyi mdov theg pa chen po/sde rab pham byed kyis tshigs su bcad pa/mdo sde brgyad bcu khungs/glang po rthsad c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v sde/sdom bcu drug bzhugs//*

- ① 关于文献内容的初步研究结果，详见熊文彬《西藏阿里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藏部分佛教文献管窥》，《南方民族考古》2020年第20辑第263-274页；有关其中吐蕃时期写卷的讨论，详见熊文彬《西藏札达皮央杜康大殿新发现吐蕃时期古藏文写卷及其初步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 ② Roberto Vitali, *The Kingdom of Gu ge Pu hrang, According to mNga' . ris rgyal. rabs by Gu. ge mKhan. chen Ngag. dbang grags pa*, *Tho. ling gtsug lag khang lo gcig stong 'khor ba' i rjes dran mdzad sgo' i sgrigs chung*, Dharamsala, Indian, 1996, p. 84.
- ③ 第司·桑杰嘉措《黄琉璃》，藏文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277-278页。
- ④ 关于杜康大殿藏仁钦桑布和萨迦班智达译入的佛经，参见熊文彬《西藏阿里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藏部分佛教文献管窥》，《南方民族考古》2020年第20辑第26页和图11；关于皮央旧寺出土青铜造像，参见霍巍《论西藏札达皮央佛寺遗址新出土的几尊早期铜佛像》，《文物》2002年第8期第71-77页和图版1-3。

译文:

……经》《圣入生起信力法印大乘经》《圣大乘密严经》《圣七如来本愿大乘经》《圣八吉祥大乘经及其偈》《吉祥天女吉祥偈》《圣四谛经》《佛说一食功德经》《圣观自在所问七学大乘经》《圣黄金大乘经》《上部摧伏偈》《八十经源》和《象力大乘经》等共十六部。

通过检索吐蕃时期的译经目录《丹噶目录》《旁塘目录》和藏文《大藏经》发现,在抄录的12部经名中,除《吉祥天女吉祥偈》《佛说一食功德经》和《上部摧伏偈》等三部经名缺载外,其余9部经名均有记载或收录。其中,《圣入生起信力法印大乘经》(汉文一译《信力入印法门经》)《圣八吉祥大乘经》《圣大乘密严经》(汉文一译《厚严经》)和《象力经》(一译《象腋经》)等4部经典见载于《丹噶目录》,分别为1570颂,第108号经典;51颂,227号经典;1220颂,第121号经典和360颂,156号经典,^①《八十经源》收入《旁塘目录》,^②显然这些经典系吐蕃时期译入。其余经典之名虽不见上述目录,但全文后被收入德格版等藏文《大藏经》,除《圣黄金大乘经》和《圣四谛经》缺译师名字外,《圣七如来本愿大乘经》(与汉文《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相似)则保存有智友(Jinamitra)、施戒(Danasila)、戒帝觉(Silendrabodhi)和智军(ye shes sde)等吐蕃时期译师的名字。^③由此可知,至少《圣七如来本愿大乘经》也在吐蕃时期译入。至于《圣观自在所问七学大乘经》则与德格版收录的《圣观自在所问七法大乘经》在名称有“学”和“法(chos)”的一字之差,德格版译本据其跋记,由吉祥燃灯智(Dipamkarasrijñana)和格微洛珠(dge bavi blo gros)译入。^④二人均为11世纪西藏著名的译师,其中吉祥燃灯智为印度著名佛学大师阿底厦(982-1054)的名字,他于1042年入藏,1054年圆寂于拉萨。^⑤因此该译本译于1042-1054年间。由于该页写卷只载经名而无全文,因此无法与德格版勘同,尚不清楚二者是否为同一译本。该写卷中记载的经典因此存在着吐蕃时期或11世纪译入的两种可能性。

与从同时,与敦煌出土的吐蕃时期的古藏文写卷相比,从字体、语法特征、页面设置和装帧来看,该页写卷体现出吐蕃写卷的一些特点。首先,与敦煌写卷一样,该页采用的也是流行的邬坚体藏文楷书,抄写非常规整;其次,页面和装帧的设计也与敦煌写本相同,尤其是穿孔的红色双圆圈几乎如出一辙;再次,语法上保存有9世纪文字厘定后的一些特点,如在后加字ra、la、na之后保留再后加字d和单个基字后面保留后加字v等。鉴于这些特点在阿里写卷中一直延续到11世纪,^⑥同时结合上述经典译入的分析,该页写卷最晚应书写于11世纪,其中所载经典至晚也在11世纪前译入藏文。总之,该页写卷中记载的经名及其断代分析表明,它极有可能是11世纪前某一佛经末页的译经或抄经跋记。

三、诏书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的内容和年代

1. 诏书录文

第4行为诏书录文,只有1行,内容非常简洁,为皇帝诏令堪布严格遵守法律、虔心修习佛

① 黄明信《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第46、76、97、64页。

② 西藏档案馆编《〈旁塘目录〉和〈语合二章〉》藏文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③ 分别参见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多田等观等编《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华语出版社,1985年,第28、60、89页。

④ 同上,第33页。

⑤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⑥ 巴桑旺堆《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年3期第61-81页。

法。全文如下：

rgyal povi lung gyis//btsun ba khirms mi rtsa ba rnams la zlo ba//khirms legs par [m] khan
po nas skyong la//chos nyan [b] shad legs par gyis// gal te lung bzin ma sgrub na/rtsa ra byas dus
na mi skrag pa ae yin//

译文：

皇帝圣旨：高僧大德、执法者等晓谕：堪布严格遵守法律，虔心闻习讲授佛法。如不遵此圣旨，岂不怕惩罚吗？

这段文字以“皇帝圣旨”为起始，要求僧人遵守法律，潜心修习佛教。书体也与前述经目的邬坚体不同，采用的是长足体。通过与西藏发现的数十件元代皇帝、皇后、皇子和帝师颁发的八思巴字和藏文的诏书、懿旨、令旨、法旨进行比较可知，二者格式基本相同，重要词汇的用词和语气非常一致；而且与现存藏文相关懿旨、令旨和法旨相比，其书体也非常接近，其内容也与元代治藏政策吻合。显然，这是一件元代诏书的录文。

首先，录文的体例和用词与元代诏书基本一致。录文由起始语“皇帝圣旨”、宣谕对象和宣谕内容三部分组成。除颁旨地点和时间阙如外，录文与西藏现存八思巴字和藏文的诏书、懿旨、令旨和法旨吻合。与此同时，其中的部分用词与元代诏书、懿旨、令旨和法旨中常见用词和语气相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尤其是“mi skrag pa ae yin（难道不怕吗？）”的使用和语气体现出元代诏书的独有特点。“mi skrag pa ae yin”是表示肯定意义的反疑问句，汉语意为“岂不怕吗？”在元代白话文圣旨中多译为“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么”，现又译为“如果做，他们岂不怕？”与八思巴字蒙古语诏书完全相同，带有恐吓的语气。^①在西藏博物馆、日喀则档案馆和夏鲁寺发现的绝大多数元代八思巴字和藏文的圣旨、懿旨、令旨和法旨中，这一用词和句式都大量出现。八思巴字诏书之例如西藏博物馆现存牛年（1277 或 1289）的《薛禅皇帝颁给拉洁·僧格贝的圣旨》、鸡年（1332）的《也孙铁木儿皇帝颁给类乌齐寺和尚们的圣旨》，猴年（1330）的《答吉皇太后颁给古香·札巴坚赞的懿旨》、蛇年（1305 年）的《海山怀宁王颁给夏鲁寺的令旨》，藏文之例如西藏博物馆藏牛年（1337）的《贡噶坚赞贝桑布帝师颁给益西贡噶的法旨》、夏鲁寺藏鸡年的《帝师贡噶洛珠坚赞贝桑布法旨》和牛年的《帝师贡噶洛珠坚赞贝桑布法旨》等等。^②

其次，录文起始“皇帝圣旨”一词指向非常明确。元代公文按照颁发者身份和地位的不同，“依汉制”，其称谓不同，皇帝颁发者称圣旨，皇后称懿旨，诸王称令旨，帝师称法旨^③且体例不同。现有八思巴字和藏文公文依次分别将皇帝命令译为“lung”，皇后和诸王之令译为“bkav”，帝师之令译为“gtam”，且十分严格。^④现存八思巴字和藏文圣旨、懿旨和令旨，圣旨起始为“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套语^⑤而帝师法旨通常则以“皇帝圣旨”为起始，然后另行接“某某帝师法旨”的套语。与此对照，该录文虽缺圣旨中“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起始套语，但在“皇帝圣旨”之后，并未明确提到“某某帝师法旨”之语，因此应

① 照那斯图《再论八思巴字蒙古语中的 ulu' ü》，《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210-213 页；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88-189 页。
② 分别参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 1-6、10-14 件档案；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Roma, vol. 2, 1949, p. 752, figs. 129-130.
③ 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第 17、113、127、215 页。
④ 分别详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第 1-6、10-14 件档案；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Roma, vol. 2, 1949, pp. 747-754, figs. 124-133. 例外的是，夏鲁寺藏镇西武靖王令旨（fig. 133）将诸王之令译为“gtam”。
⑤ 在夏鲁寺藏镇西武靖王令旨中，藏文译为“gnam gyi she mong la/rgyal povi bsod nams la//”，相较于西藏档案馆藏八思巴字圣旨部分简略。见 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Roma, vol. 2, 1949, pp. 752-754, figs. 132-133.

为圣旨，而非帝师的法旨，亦非诸王的令旨。特别是录文最后对“圣旨（lung）”一词，亦即：“gal te lung bzin ma sgrub na/rtsa ra byas dus na mi skrag pa ae yin//（如不遵此圣旨，岂不怕惩罚吗？）”的再次强调，进一步表明了录文圣旨的性质。

再次，诏书录文的书体与上述藏文圣旨、懿旨、令旨和法旨的长足体书体基本一致，体现出元代藏文诏书、令旨、法旨等公文书体的显著特点。虽然明代藏文诏书的书体也继承了元代这一书体的特点，但综合其中用词和语气等特点，录文应为元代诏书。

最后，录文内容与元代治藏政策吻合。通过与现存元代八思巴字和藏文的诏书、懿旨、令旨和法旨对比和相关文献的检索，虽未发现与该录文完全吻合的圣旨等官方文书，但其内容与元代朝廷扶持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因俗致宜、尚用僧徒，任用帝师为首的藏传僧人来治理西藏的政策一脉相承。前人对此多有研究，在此不复赘述。^①

综合前述，该写卷第4行文字笔录的是一份元代圣旨。但与元代圣旨相比，鉴于其起始语和结尾部分签发地和签发时间的阙如，应为元代圣旨主要内容的摘录。

2. 八思巴字印文

该写卷在第4行诏书录文前后上方同时钤有5方墨印（图2-3），其中前端3方，后端2方。按印文的种类，由图案和文字两种组成。其中前方3方印文相同，图案由上方象征佛法僧的三个圆圈组成的摩尼宝珠和其下的吉祥结构成，尺寸为1.8x1.5厘米（图3）。在后上方所钤的2方印文中，前者印文亦为图案，不过略有不同，由上方的吉祥结和其下一个有待辨识的图案构成，尺寸亦为1.8x1.5厘米；而后者则由上方三个圆圈组成的摩尼宝珠和其下的八思巴字组成，形制略大，尺寸为2.1x2.1厘米（图2）。八思巴字印文在此出现，进一步佐证了第4行圣旨录文的时代。

八思巴字印文由于磨损，文字不清，虽经多位学者辨认，意见不同，尚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其中的八思巴字为“chos”字，即“佛法”或“教法”之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系“che”字，但其意不明。^②因此，印文中的八思巴字仍待进一步斟酌。虽然如此，通过查阅已公布的八思巴字和元代公私印章，虽未发现与此印文完全相同的印章，但其由摩尼宝珠纹与八思巴字组合的印文形式，则与西藏博物馆藏兔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丁沙鲁宣慰司官员文告》末尾所钤墨印，除八思巴字外，完全相同（图4-5）。^③由此可知，这方印章在元代并非孤例。鉴于八思巴字创制于1269年，这方八思巴字印文的年代应介于1279-1368年之间。

综合上述，皮央杜康大殿保存的写卷散页从内容、页面设计、装帧、书体和语法等特点来看，系9世纪末至11世纪期间遗存的佛经写卷之一。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期间古格王国一位不知名的人士在佛经目录末尾的空白处摘录了一份元代皇帝颁布的圣旨并加盖了以八思巴字印为首的3方墨印，留下了5方印文。

四、发现意义

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遗存的元代诏书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在阿里地区的首次发现，在学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首先，该发现为元代中央政府治理阿里提供了直接而又重要的实物证据。众所周知，元朝为了有效统治西藏，除在中央政府设立宣政院，在萨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外，针

① 关于前人对元代治理西藏成果详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详见陈庆英、张云、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元代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

② 感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陈庆英、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巴桑旺堆、中国人民大学的乌云毕力格和西藏档案馆的才让加等四位著名学者帮助辨识印文中的八思巴字。

③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第15件档案。

对藏族地区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等情况，还在相应的一些地区直接设置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等军政机构。早在成吉思汗时代，随着蒙古军队西征抵达拉达克，蒙古汗国就在最早归附的阿里地区设立了“纳里速（阿里）都元帅”。1292年左右，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将纳里速都元帅和1280年设置的乌思藏（卫藏）宣慰司整合成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宣慰使五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捕盗司官一员”，^①管辖“包括今西藏自治区除昌都地区以外的地区和现在在国境以外的列城等地”。^②其中，在阿里三围设置“纳里速古儿〔鲁〕孙元帅二员”，^③以加强对阿里三围地区行政和军事的管理。然而，元代中央政府对阿里的治理只有《元史》等汉藏文献零星的记载，实物也仅限于镇西武靖王和帝师奉圣旨向包括阿里三围在内的全西藏颁发的几件公文，^④而阿里地区则未见任何保存至今的诏书。此份诏书录文表明，元代皇帝向阿里地区的佛教管理颁布过圣旨，从而为元代中央政府对阿里地区的施政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细化了管理的内容。其次，诏书录文从侧面反映出施政的效果。诏书录文的权威性和珍贵程度虽难以与真正的诏书比拟，但它反映出政令实施后的实际效果。诏书录文的笔录者对诏书的摘录不仅体现出对诏书权威性的遵从，而且笔录行为本身反映出诏书中的政令已在其所属地区阿里得以颁布和实施，否则笔录者不可能熟悉诏书的格式、用词和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诏书录文本身就是所颁政令得以实施的结果。由此管窥，元代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在阿里地区得到了遵照执行。最后，《元史》虽对阿里三围元帅的设置进行了记载，但其治所缺载。从诏书录文发现地管窥，“纳里速古儿〔鲁〕孙元帅二员”中一员的治所，极有可能就设置在古格王国的中心区域、即今札达县境内的古格故城或皮央。

总之，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写卷散页中保存的元代诏书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为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阿里三围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证据，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这一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李 想）

① 宋濂等《元史》卷87“百官三·宣政院”，中华书局，1976年，第2198页。

② 陈庆英、张云、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元代卷》，第94页。

③ 宋濂等《元史》卷87“百官三·宣政院”，第2199页。

④ 夏鲁寺藏，其中之一为镇西武靖王鼠年七月十一日颁布的任命夏鲁万户长古相贡噶顿珠为宣慰使的令旨，另一件为龙年四月八日帝师贡噶洛珠坚赞颁布的帝师法旨，详见 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Roma, vol. 2, 1949, pp. 750 - 753, figs. 131, 133.



图1 八思巴字印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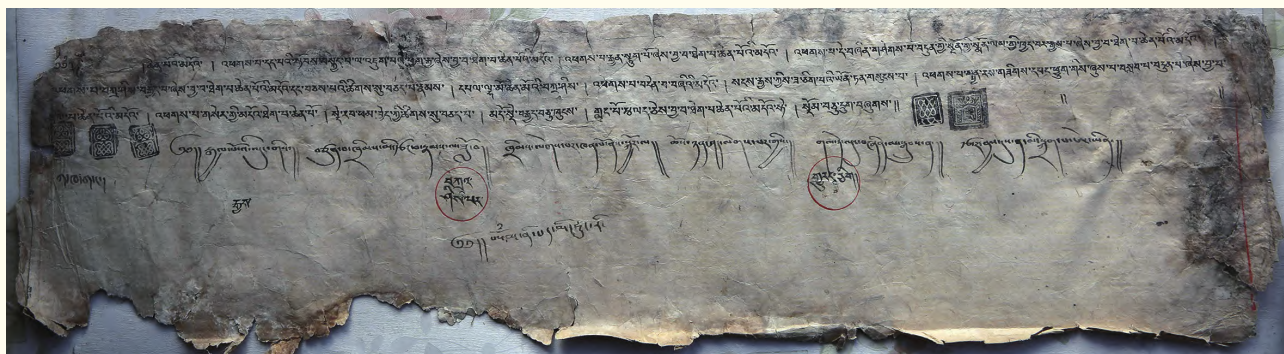


图2 西藏阿里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藏元代诏书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写卷



图3 吉祥结印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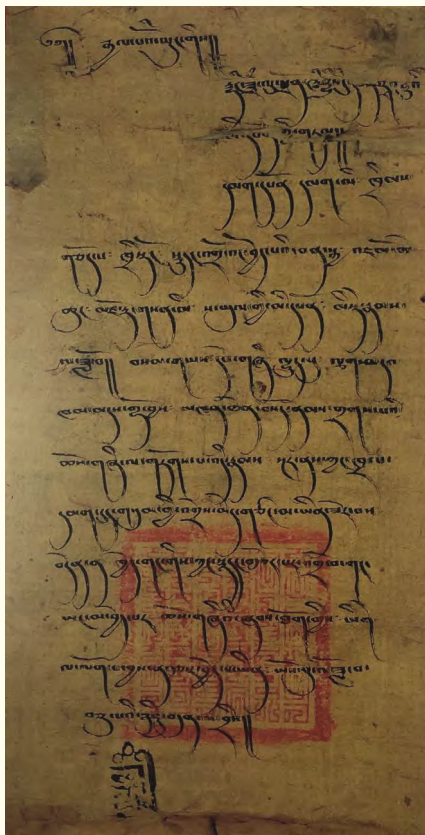


图4 西藏档案馆藏《丁沙鲁宣慰司文告》，采自西藏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5件



图5 八思巴字墨印，《丁沙鲁宣慰司文告》局部